

园丁

王道生



封面设计：陈雅丹

园 丁

王道生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11印张 200千字

1979年3月北京第1版 197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,000册 定价0.7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教育战线革命师生与“四人帮”一伙斗争的中篇小说。

作品通过一个中学教师方华的遭遇，深刻地揭露了“四人帮”一伙任意践踏党的教育方针，残酷地打击迫害革命师生的罪行，塑造了方华敢于斗争、英勇牺牲的英雄形象。

小说真挚感人、朴实无华，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弦。

献给为党的教育事业
献身的同志们

第 一 章

下午的课间操刚做完，在五七中学工作的爸爸给我打来一个电话，说他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高石大伯，要我今天晚上去参加他们的全体教师会。我心里可纳闷了。中学老师开会，干么要我这个小學生参加啊？虽然我今年已经十二岁了，可是要到下半年才能进中学呢。

放学的时候，夕阳已经落到秀丽的望江峰后面。我出了校门，就顺着黄山道往南走。从我们培红小学到爸爸工作的五七中学，本来可以乘两站汽车，可是你瞧，正是下班的时候，汽车站上等车的人密密麻麻的，我宁肯走这两站，也不想去凑那个热闹。

马路上的自行车象流水一样从我眼前驶过，车铃散响。我走在人行道上，和煦的春风掀动着我的胸前的红领巾，吹拂着我的脸，暖暖融融地直吹进我的心里。我正在猜想：今天晚上高大伯他们到底要开什么会呢？猛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从沉思中惊醒。嘿！原来已经走到黄山道副食店门口了，喊我的人，正是副食店的主任魏伯伯。

“朱小芳，是去找你爸爸吗？”

“是呀，高大伯要我去参加他们的会！”

“什么会呀？”

我笑着直摇头：“不知道！”

魏伯伯笑咪咪地朝我扬扬手，喊道：“见了高大伯和你爸爸替我问好！”

我愉快地答应着，走到了十字路口。这条和黄山道垂直交叉的宽马路是解放路。哟！五七中学的红漆铁栅门已经看见了，就坐落在解放路北。

我进了校门，和传达室的王大爷打了招呼，他捋着胡子跟我点头。

这五七中学啊，是我从小生活长大的地方，对这里的一切我都象对自己家里一样熟悉，她的面貌影象刻在我的脑海里。眼前这宽阔广大的操场，东西长足有三百米，南北宽也有二百米。我脚下走的这条青石甬道，直通向操场后面的四层工字楼，把大操场分成两半，西半边是足球场，白色球门遥遥相望；东半边是篮球场，两对绿色篮球架仰着头立在那里。篮球场旁边还有单双杠、平衡木和沙坑……然而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，是一年多以前在这里发生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。当我直视前方，看见了操场后面那座用砖和水泥砌成的舞台，我的眼睛就禁不住涌满热泪。再看舞台后面，就是学校的四层主楼，东头是实验室、会议室；西头是办公室、图书馆；中间是三十二个教室。一楼正中的那个教室，是我永远值得纪念的地方……主楼后院，沿着校墙盖了一圈青砖平房，是老师的宿舍、食堂、托儿所、学校的仓

库，那些地方都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记忆。眼下，桃花盛开了，想那大楼后窗前墙根旁的株株桃树，都已经披上绚丽多姿的粉红色的纱巾，因为我闻到浓郁的花香了。

当我走进楼门的时候，正好碰见从楼梯上跑下来的陆玲阿姨。她一见了我，高兴得张大了嘴，伸开两只胳膊说：

“哎呀！这不是小芳吗？我正要找你哩！”

她抱住我看了一阵子，帮我拉拉衬衣的领子，又给我舒展平红领巾的后角，拉起我的手说：“走，先跟阿姨吃饭去，食堂开饭了。”

我跟着她往楼后面走，还没等跨进食堂的门坎，她就大声嚷道：“你们看，谁来了？”

老师们看见我来了，一齐围过来。

“喏！我们的小芳来了。”

“小辫子这么长了，自己会梳吗？”

“你看这对大眼睛，象对黑亮的水葡萄，两只小酒窝还会动呢。”

“也是喜欢抿着嘴笑，这孩子真是越长越象她妈妈了……”

你一言，他一语，这个摸摸头发，那个拉拉小辫儿，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这时高大伯和爸爸一前一后走了进来。高大伯看见我，弯下腰，抚摸着我的肩膀头儿；他眼睛明晃亮的，好象遇见了久别的孩子，端详了我好一阵才说：

“小芳，怎么最近不常来了？”

“放了学，我要回家做饭，收拾屋子。”

“你学会做饭了？”

“学会了蒸米饭，做馒头，擀面条。”

“是爸爸让你做的？”

“不，是一年前妈妈对我说的。她教我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，帮助爸爸做事，好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工作。”

听了我的话，高大伯一下把我搂进怀里。他搂得是那么紧，两只胳膊微微有些颤抖。他看定我的脸，不住地点着头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可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，他的千言万语都从他的眼睛、他的双臂传进了我的心里。

我说：“高大伯，你比以前胖了。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，你看叔叔阿姨们不是都胖了吗？”

“嗯，是都胖了。”我笑着说，“现在多痛快呀！我们班主任杜老师还叫我给她揪白头发呢。”

我的话把几位男老师逗笑了。

我问：“高大伯，今晚怎么让我来参加你们的会啊？”

高大伯摸着我的头顶，看定我说：“我们今晚的会，不能缺少你！”

晚上开会的时候，我跟着爸爸来到会场。嗨！大会议室里灯光通明，雪白的墙壁也在发亮，到的人可真多，一个个眉开眼笑，好象就要迎来什么喜事一样，连会场上的空气都有喜庆味儿。陆阿姨招呼我们坐在头一排，她低下头对着我的耳朵说：“小芳，散了会，你跟我去宿舍一趟，我有事。”

我刚要问她什么事，只听得会场上爆开了掌声。啊，是高大伯和其他校领导进来了。高大伯走上会议室的讲台，抬起手让大家安静。谁知掌声一阵猛似一阵，象决了堤的

潮水哗哗地响个不停。高大伯被这热烈的气氛所感染，他也笑了，举起手使劲鼓了一阵子，才大声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！同志们！……”

喊了几声之后，掌声渐渐停下来。高大伯兴奋地说：

“大家都知道了，明天，地委要召开慰问中小学教师大会。这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亲切关怀！这只有在打倒万恶的‘四人帮’之后，我们人民教师才能有今天……”

暴风雨般的掌声重新把高大伯的话打断了，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。我也好象变成了一名人民教师，心里甜呀，美呀，乐呀！我举着小拳头，情不自禁地跟着高喊：

“感谢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！”

“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高大伯费了好大劲儿，才又让大家安静下来，他大声说：

“现在，我代表上级党委，郑重地给每位教师同志发大会入场券……”

他的话音又被猛烈的掌声所淹没。他把两只手高高举起，伸开手掌不住地往下压，那面孔也变得严肃起来，他的犀利的目光把掌声和喊声压了下去，停了一会儿，等会场十分肃静了，他才庄重地说：

“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，第一张入场券，发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好教师，共产党员方华同志！”

整个会场一下子静得好象没有一个人似的，可我的心，

猛地抽跳了一下。我听得清楚极了，高大伯说的是我妈妈，是我妈妈！可是……妈妈不是已经离开人世一年多了吗？高大伯这是怎么了？

我望着他那一双虽然长胖了点儿，可是还是比别人消瘦的脸，泛着坚毅顽强的光；我看着他一到激动时就习惯地紧握的右拳，这时又握个腾紧。他低沉有力地说：

“方华同志生前在党的教育战线上，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，同‘四人帮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。她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，可是她的榜样一直活在我们全体师生的心中！今天，当我们欢庆粉碎‘四人帮’伟大胜利的时候，我们更加怀念她；当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，掀起教育革命大治快上新高潮的时候，我们更加需要她！可惜，她没有能亲眼看见今天的胜利！”

说到这儿，高大伯的眼睛水汪汪的。陆阿姨伸出右臂又把我往她怀里搂了搂，她的清凉的泪珠滴落在我的耳朵上。我屏住呼吸，瞪着两眼望着高大伯。这时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声调陡然高了上去：

“但是，一个方华倒下去，千万个方华在成长！她的女儿，也是我们人民教师的女儿朱小芳，今年就要小学毕业了！这些年来，她跟着自己的妈妈，经历了教师生活的风风雨雨，也同‘四人帮’作了坚决的斗争。这张入场券，就请方华同志的女儿朱小芳来代领吧！”

会场上，静悄悄，静悄悄的。陆阿姨把我扶起来。我咬着嘴唇停了一会儿，就迈开双脚走上前去。我忘记自己是怎样从高大伯手里接过了那张入场券，仿佛记得我给他敬

了一个礼，象期末接受奖状那样，我把那张入场券庄重地捧在胸前。入场券鲜红的纸面和艳丽的红领巾连成一色。我这时想起辅导员老师讲的话，这红色是烈士的鲜血染红的；我好象看见，在这庄严的血色中，也有我妈妈的……

我听见会场上响起了掌声，我的心颤抖着，一阵紧似一阵。我的血直涌上脸颊和耳根，好象要冲出来和妈妈的血流在一起。

我看见一百多个拳头一齐举了起来，象一片燃烧的火炬。口号声震得窗户隆隆作响，我跟着一百多张喉咙怒吼着：

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！”

“向‘四人帮’讨还血债！”

我看见高大伯走下讲台，来到爸爸面前，他们紧紧地握手，老长老长时间不松开。高大伯说：“局党委宋书记特别嘱咐我，代表他向你一家表示亲切慰问！”

爸爸坚强地说：“老高，请你转告上级党委，我代表方华感谢党、感谢华主席！我还要代表方华完成她没有做完的工作……”

散会以后，老师们又蜂拥上来把我团团围住，问寒问暖，问得我心里象生了一盆火。大家散去回家了，爸爸让我先乘汽车走，他自己骑自行车去幼儿园接弟弟。陆阿姨把我领到她的宿舍，把一个软软乎乎的红布包放在我手上，说：

“快拿好回家吧，我送你上汽车。”

汽车开动了，她招着手，叮嘱道：“拿好了！别掉了！”

我下了汽车，踏着月光，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院门。徐奶奶、金大爷和其他邻居家的窗子，已经拉上了窗帘，人声笑语从窗里飞到这幽静的月夜里。只有我们家，锁着门，玻璃窗上没有灯光。

我开了锁，推开门，拉了一下电灯的开关，八瓦日光灯啪啪闪了几下着了，把屋里照得清亮。啊！这就是生我长我的家呀！一间细长条的房子，前面是门，后面是窗。一张普通的红漆铁床，横放在后窗下。就是在这张床上，我多少次从梦中醒来，听到过妈妈和爸爸的谈话和争论，脸上粘到过她那滚热的泪水。铁床的前面，紧靠左墙立着一架普通的偏开门衣柜，衣柜顶上放着妈妈生前的衣箱。衣柜对面是一张双屉写字台和两把木椅。就是在这张桌子上，妈妈曾经通宵达旦地备课，批改作业……

我走到写字台前，打开红布包，顿时鼻子一酸，眼睛一热，满眶的泪水滚了下来。我认出来了，红布包里包着的是那件妈妈生前没给我织完的毛线衣；后来，陆阿姨要了去，今天把它织完了，胸前还用金黄色毛线织了一朵大葵花。我抹去滴落在葵花上的泪珠，猛抬头端望挂在雪白墙壁上的妈妈的遗像。我不禁喊了声：“妈妈！”我搬来木椅踩上去，双手抱住镜框，把挂满泪水的脸贴在冰凉的玻璃镜面上。我说：

“妈妈！妈妈！你知道吗？华主席领导我们打倒了‘四人帮’，辛勤的老师又受到社会的尊敬。上级要开大会慰问老师了。党没有忘记你，高大伯给你发了入场券，你的小芳替你领来了！”

明洁的镜面上沾满了泪水，我掏出手绢轻轻擦啊，擦啊。擦着擦着，我收住了泪，凝视着妈妈端庄的面容，心里说：对，我不能哭！我的妈妈多么朴素大方，多么刚毅坚强！你那一双油黑明亮的大眼睛，永远是那样闪着不屈的光，你那两道细长的黑眉毛永远是那样舒展着，你那一双温和慈爱的圆脸盘上，找不到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悲苦。我也应该象你一样坚强。

我抹去脸上的泪，又去擦拭挂在遗像两侧的十几面奖状的镜框。这些奖状印画着妈妈三十五年火红的岁月。她在小学和中学，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，在大学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；当老师以后，她又被评为模范教师，参加了教师代表会议。不过，这一切在她活着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对人说起过。她把这些奖状包好放进衣箱底，一直没有显露。这是在她离开人世以后，爸爸才精心制做了镜框，涂上油色，把它们镶在里面，挂在墙上。爸爸对我说：“小芳，妈妈是解放后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民教师，你可要好好学习妈妈呀！”是的，我应该学习妈妈，象她那样学习，那样生活，长大了象她那样工作和斗争。

我脱下外面的罩衫，穿上由陆阿姨替妈妈给我织完的鲜红的毛衣。长短肥瘦和领口袖口全都正好。我顿时感到妈妈的体温还在温暖着我。我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崭新的毛衣象血一样鲜红，盛开的葵花象金子一样闪光。我猜这里织进了陆阿姨的希望，要我象葵花一样永远向着太阳开，向着党开。

我从口袋里的日记本里，把那张不平常的入场券拿出

来。灯光下，我清清楚楚看见纸面上印着八个醒目的大字：
“向辛勤的园丁致敬！”

啊！向辛勤的园丁致敬！我抬起头来，凝望贴在妈妈遗像上面的那幅画：《园丁》。那是妈妈的学生张云飞照着妈妈保存的一张新闻照片画的。画面上是在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，敬爱的周总理正在和一群大学毕业生亲切交谈，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扎着两根短辫的女学生，就是我的妈妈！周总理握着她的手，满脸笑容地在问她什么话。这幅画是云飞哥哥送给我的。它使我回忆起多少难忘的往事啊！

我双手捧起那张入场券，把它恭恭敬敬地插在妈妈遗像的镜框上。妈妈呀！献给你，献给你！这张入场券是党和人民对你的深切怀念。妈妈呀！收下吧，收下吧！我从你身上真正看到了一个园丁的生活和斗争，真正懂得了“园丁”这个词的深刻含义……

第二章

谁都有妈妈，谁都爱自己的妈妈，可是当我懂事的时候，我竟为自己的妈妈难过。她对我可温和了，但有时候，她并不向着我。就拿我上幼儿园的事来说吧。那年，我们托儿所毕业了五个小朋友，当然最好是都进幼儿园。幼儿园，有好玩的滑梯、漂亮的木马、变着花样摆的积木，还有象游艇一样的摇篮，坐在里面或躺在里面，荡荡悠悠地美乎极了！听说幼儿园里的小人书多得数不清。我早就盼着能进幼儿园看小人书，听老师讲故事，拿起小画笔画图画了。谁想到呢，幼儿园只给了我们四个名额。这事情可就不大好办了。学校的领导就要五位妈妈商量解决。人家都同意让我去，说妈妈爸爸都是本校老师，家住的又很远，我又没有个奶奶姥姥照顾。看来我进幼儿园是十拿九稳的了。可是妈妈十分认真地说：“还是让二蛋去吧，他爸爸患过肝炎，他妈妈家务负担重。小芳这孩子挺老实，我先每天带着她上班，有几本小人书就把她哄住了。”

晚上回到家，我抽抽噎噎地哭了个好伤心。妈妈不向

着我，反而向着二蛋子。这一下，好玩的滑梯，漂亮的木马，变着花样摆的积木，全完了！动听的歌，快乐的舞，悦耳的手风琴，一排排整齐美观的钢架床，一把把油漆光亮的小木椅，全都和我不沾边了！我越哭越伤心。

妈妈把我拉到她怀里，掏出手绢轻轻地给我擦眼泪。我看见她的眼睛里又是爱抚又是责备，她温和地说：“小芳，雷锋叔叔的故事白听了？毛主席号召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，现在可遇到真格的了，应该怎样做啊？”

我一点儿一点儿地停止了抽泣，从她手里接入手绢，自己擦去满腮帮子的泪水。我再看妈妈，她紧闭着嘴，两眼瞪着我，可是那嘴角的笑纹告诉我，她是假装生气哩！我一头扎进她怀里，她低下头把脸紧紧地贴在我的头发上……

就这样，我从四岁起就天天跟着妈妈到学校去“上班”，有时还跟着她去家访。我发现妈妈工作起来，就什么都忘了。她每回坐到办公桌前，就在书上划呀、点呀，在本上写呀写呀。一摞一摞的作文本，一纸袋一纸袋的练习，她都一字一字地批阅。我最喜欢看她批改作文。她右手拿着一支蘸水笔，笔杆顶着下巴，两只眼睛盯在作文本上，闭着嘴一声不吭。有时她眉头一皱，用笔在纸上划一个小方块，把一个字四面包围起来，好象那是个坏蛋。有时她拿着笔在一行字的上方点几下，最后在这句话下面划上一条红线。有时她眉毛一扬，眼睛一亮，嘴也咧开了，赶紧高兴地在那些语句下面画一串红圈，然后在旁边写上一些字。起初，我就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你笑什么？”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顺口说：“去吧，去吧，别捣乱！”我委屈地说：“谁捣乱了？问你句

话也不行！”她只好转过脸，无可奈何地轻轻一笑说：“同学写出了好句子，妈妈高兴。你去看你的小人书，别说话，老师们在办公呢。”

妈妈的一颗心，全被学生们占去了。她常常把我抛在一边，和她的学生亲热地小声交谈。她也有时跟调皮的学生着急。急得厉害了，一只手使劲包住另一只握着拳头的手，好象生怕那拳头会出来打人似的。我知道她这是强忍着耐性。每到这时，她就喘口大气对那学生说：“先回去吧，回去好好想一想，明天咱们再接着谈。”学生回去想了没有，我不知道，可是妈妈总在想，连回到家她还在冥思苦想。她有时翻阅毛主席著作，有时吃着吃着饭问爸爸：“哎，明天我准备这样跟他谈，你看行吗？”爸爸莫名其妙地问：“跟谁谈？谈什么？”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说：“算了，吃饭吧，吃完饭我再告诉你。”

唉！我算看透了，妈妈这一辈子就是为她的学生们活着。

可是我渐渐发现妈妈算是倒死霉了，连我也跟着她受罪。天底下竟有这样不公平的事：妈妈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学生，可有些其他年级的没良心的坏小子，在背地里辱骂她，后来连我也给骂了。那时候我已经五岁了，好话坏话也听得出来了。我心里憋气窝火，整天没个笑脸，连睡觉都噘着嘴。

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关切地问我：“小芳，你好象有什么心事，说出来让妈妈听听好吗？”

我瞪眼皱眉地看着她：“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当老师？”